

多甫拉托夫：一个重要和鲜亮的后现代主义现象

张建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多甫拉托夫是一位有着“严肃的存在主义作家”称谓的当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揭示了现代人生命存在的本质特征——生活的荒诞与生存的荒谬。他从一种“伪纪实主义”的高度以“本真的”叙事手段实施着对这一荒诞的叙说。“笑”乃是他美学体系的基础之源，他的创作是一种含泪的民间“笑文化”的绝妙体现。本文以作家若干重要的短篇小说为例，从文本荒诞的意义内涵、荒诞的叙事方式、作家创作的哲学理念和“笑文化”的具体内涵出发，深入分析了这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创作的诗学特征。

关键词: 多甫拉托夫；荒诞；本真；叙事；笑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多甫拉托夫无疑是世纪之交最“热”的俄国作家中的一位。其声望首先发在美国，他“是除了布洛茨基和阿克肖诺夫外，西方最著名的一代俄罗斯作家”（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5: 8）。他生命最后四分之一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那里有他12年的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1986年他获美国笔会最佳小说年度奖。1989年他的短篇小说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的小说一起被列入美国出版的世界优秀小说文库中。此间美国《纽约时报》的书刊评论上发表的有关他创作的上百篇评论文章都对他交口称赞。80年代后他的名字逐渐在世界其它各国，特别在英国、丹麦、芬兰、以色列、瑞典、日本等变得响亮起来。1989年是多甫拉托夫凯旋回归俄罗斯的一年，《外国文学》杂志、莫斯科大型文学月刊《十月》、列宁格勒文学杂志《星》、爱沙尼亚文学期刊《彩虹》几乎同时发表了他的作品和有关他的详细介绍。多甫拉托夫在俄国的“热”出现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蔚成气象的20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的两年内，他的3卷小说集在俄国3次出版，发行量达15万册。他的创作还走进了高校的文学教科书中，被搬上了银幕。这对于一个在俄国读者中并不被看好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虽然作家生前并不默默无闻，但人们对他的认识却远非像今天这样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正如评论界众口一词所言，多甫拉托夫是“一个重要的和鲜亮的现象，一个非常值得关注、深入研究和让世人引起共鸣、敬重的现象”（А.Генис 1996: 466-467）。

谢尔盖·多纳托维奇·多甫拉托夫（1941—1990）出生在苏联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乌法。父亲是一名导演，母亲是个演员。从1944年到1978年侨居美国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列宁格勒居住。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新闻系学习。1962—1965年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担任过苏联劳改集中营的守卫人员，70年代曾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从事新闻工作。多甫拉托夫对苏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种种荒唐的现象有着深切的了解，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进行着虽然坚韧却无果的抗争。他在列宁格勒船舶研究所和光学机械联合企业办过报纸，在儿童杂志《篝火》当过编辑，还有过一年余当导游的经历。1978年作家携家眷离开苏联，定居美国纽约，直到1990年去世。他说：“我是为了当一个作家才

出走的……如果我的创作能在俄罗斯出版，我绝不会离去”（А.Генис 1996：345）。多甫拉托夫生前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在美国的杂志、报纸和电台的创作、编辑活动有关。在美国期间，他是《纽约人》的主要撰稿人，是除著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外得以在这份著名刊物上发表作品的第二个俄罗斯作家。他还是俄文报纸《新美国人》的创刊人和主编之一（1980—1983）。他逝世前多年在美国《自由电台》做编辑。多甫拉托夫始终用俄文进行文学创作，是俄罗斯第三个侨民浪潮中最年轻和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多甫拉托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步入文坛的，这是苏联“政治铁幕”时代中一个为时不长的“解冻”间隙。作家此间曾受到像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这样一些俄罗斯“回归作家”经典传统的影响，也接受了像海明威、塞林格、贝娄、福克纳、乔伊斯等西方作家的创作理念，从中找到了他的文学理想，也形成了他这一代文学人的世界观。60 年代他曾写过诗歌，创作了不少讽刺性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讽刺中篇有《别样的生活》和《驴子应是瘦的》。由于作品对现实生活荒唐本质的形而上的揭示，因此作家把它们称为“哲理谬论”。60 年代末他写了第一部，也是一生中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拳台仅一人》。从 70 年代开始，他才真正找到了属于他的创作体裁——中、短篇小说，这也是他 30 年创作生涯中最富成就的创作领域。这些作品大都收集在他日后的 4 部小说集中。《监狱》（1982）描写的是作家在集中营当守卫时的见闻，《妥协》（1981）记述了作家在爱沙尼亚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被作家称作“家庭画册”的《我们》（1983）是他对家庭祖孙三代生活的思考，《手提箱》（1986）是作家对侨居美国前后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这 4 部被视为他创作最高成就的中篇小说实际上是系列短篇小说集，是多甫拉托夫“笑文化”的精品。此外，他还创作有中篇小说《保护区》（1983）、《外国女人》（1986）、《分支》（1989）等。

由日常生活中大小不一的各种故事表现形形色色生命存在的真实情状，从而揭示现代人生命存在的本质特征——生活的荒诞与生存的荒谬，正是这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创作题材的鲜明特征。

如果说现实主义作家索尔仁尼琴笔下的集中营文学展现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苏维埃社会政治中一种历时性的“专制的暴力时空”，那么多甫拉托夫笔下的《监狱》要表现的却是具有共时性的，苏维埃人的生存形式是一种最为直观、最为显而易见的人的荒诞存在。短篇小说《演出》写的是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囚犯在监狱副政委的艺术指导下表演反映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等领袖革命活动的话剧。演戏的犯人始终在自我与角色中转换。高唱国际歌的扮演列宁的犯人突然成了一个村夫，显得神秘而狡诈，他的脸也变得冷峻而粗鲁，还眯上了眼睛。扮演捷尔任斯基的犯人竟然会在舞台上将粘上去的胡子摘了下来，不好意思地放在了道具电话机旁。坐在第一排看戏的人先笑了，过了片刻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作为囚犯的演员们会突然意识到，犯人与领袖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被剥夺了自由而后者犯罪却不会受到惩罚。囚犯观众对荒诞的认识已经超出小小的监狱舞台，而扩大到整个集中营，整个社会。集中营世界与非集中营世界其实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狱吏与政治犯似乎都在为着同一个目标——人民的幸福——而斗争，他们又几乎用着同样的方法在行事，尽管他们相互敌视，势不两立。在作家看来，自由人与被囚禁的人的生存要义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集中营不啻是一种“精致的”国家模式，也是苏维埃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现实社会中处处充满了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荒诞。荒诞由舞台、戏剧的表现转换成了一种特定社会条件下人的不自由的本质存在。小说将生活与舞台，现实与演戏，铁蒺藜内外两端的生存状态相类比，指出其本质就在于它们无一例外的荒诞性。《监狱》的叙事主人公还在写给编辑的信中以一种“互文性”的手段表述说，“在集中营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无需压制与强迫便能取得胜利”，表达了“集中营美学”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相似性——极权下的荒诞。

与这种政权意志相辅相成的是由人自身缺陷造成的现实生存的荒诞。系列短篇小说集

《手提箱》中叙事人“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人，或同事，或亲人，或同学，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着，各种不同的生存动机激化了生活向违反逻辑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身份与能力，角色与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分裂甚至自我颠覆的状态。这种状态折射了现代人在精神、人格上的悖谬，还隐喻了由这一悖谬而造成的人生存状态的无序。人们往往都被欲望或非理性的潮水追赶着，内心焦虑而躁动。他们以一种荒诞的表演，诠释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理念，同时也让读者看到，现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最为基本的伦理原则，道义准则以及人格尊严，都已无法逃脱被摧残与被伤害的命运。

叙事人在短篇小说《大官的皮鞋》一开头说，两个世纪前，历史学家的卡拉姆辛对俄罗斯的社会状况曾用两个字作过高度的概括：“偷窃”。如今 200 年过去了，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俄罗斯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居然没有任何变化，“人人都在偷，而且逐年愈演愈烈”，不但“什么东西都拿”，而且“偷得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从瓷砖、石膏到螺栓、螺钉，从线头儿、玻璃到海报柱，直至很快会结成石头块的水泥浆。连叙事人自己也毫不例外，也“偷”。虽然他偷的皮鞋较为实用，但他偷鞋的目的也未必是穿，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偷。“或许是我的被压抑的异见倾向作祟。或许是我身上的犯罪本性抬头。或许是某种神秘的破坏力量对我在施加影响。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发生。”荒唐透顶，荒诞之极。两百年来普遍而又荒唐的偷窃行径一方面说明了此种社会弊端的普遍而又积重难返，人的积习难改，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俄罗斯人生存荒谬的绝对性，人本性中非理性成分所导致的行为荒谬的绝对性。

在雕塑大师的工作室里，“我”看到了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伟人塑像：“臀部、性器官和凸现的肌肉，无不精雕细刻，活灵活现”。雕塑大师说，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艺术作品通过“现实主义”的语言暴政，使艺术家的想像力和创造性渐渐萎缩，艺术的丰富性和多元性遭到了可怕的压抑。艺术世界通过这种人为的“过滤器”，贫乏、单一到了尴尬的境地。然而，由于雕塑艺术的对象是伟大的领袖列宁，而“此类订单难能穷尽”，因此这一类塑像仍获利丰盈，所以“我们的雕塑家都是些富人”。作者以一种戏仿和调侃的方式揭示着艺术与生活中的荒诞，消匿着艺术与现实间的鸿沟。

充满矛盾的现实往往是以二律背反的形式植根于人们的意识存在之中。包括革命领袖在内的所有人，无论是他的现实存在，还是艺术存在，不管他有多么伟大、神圣，其中必然包含着平庸、滑稽。小说中革命领袖列宁的英明伟大、崇高神圣被极大地粗略化、简约化了。遍布苏联各地的列宁塑像成了大家十分熟识的，一个在大路上喊叫着拦车、搭车的旅行者形象：“他右手指着通往未来的道路，左手插在敞开的大衣口袋里”，列宁喜爱的鸭舌帽也被雕塑家塑成了两项，一项戴在头上，一项却攥在手中。在革命精神、思想意义缺失的情况下，与众人无异的“旅行者”便成为一种伟人的生存方式，这种“旅行者”的生活逻辑越是平淡、越是生活伟人也就越荒诞。当人们把对领袖的崇敬、对领袖权威的盲目的屈从和顶礼膜拜变成一种伦理规范的时候，领袖存在的荒诞性也就显示了出来。

《冬天戴的帽子》讲叙了作者当编辑生活经历中的若干个片断：犹太血统的女打字员拉依莎因在一个有着反犹太传统的编辑部工作并显示出富有叛逆精神的生活方式而最终被迫害致死；“我”不辞而别，离开编辑部他去；“我”与兄长的相处，其间与他 3 个女友的交往；在大街上遭遇流氓的袭击及受伤；在商店里与当售货员的老同学的邂逅。

编辑部里因拉依莎的死而气氛阴郁凝重，有人悲伤地抽烟，有人两眼发直，有人泪水涟涟……编辑博格莫洛夫是惩治拉依莎，致其于死地的第一个发难者；捷留金与拉依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害怕受到死者的牵连，反复强调与死者性格迥异、没有共同语言；小品文作者西多夫斯基谴责死者自戕的罪孽，表达捍卫编辑部利益、热爱新闻事业的耿耿忠心；“我”则采取惹不起却躲得起，一走了之的方式。专制主义与明哲保身从来就是一对难兄难弟，谁

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可悲下场。编辑部里各色人等的表现如同一条条生存印痕，记录下了人被动存活的真迹。人与人在这里成为一种荒唐的“互文性”镜像。

编辑部事件之后，“我”本想对兄长述说胸中的郁闷，摆脱心灵的苦闷，却随着“我哥”波利亚自我欲望的一番表演，使生活进程进一步滑向了荒诞性的喜剧边缘。“我”非但未体验到本该情同手足的兄长的理解、体贴、温暖，反而处处陷入他的算计，甚至连妻子让“我”买葵花籽油的一个卢布也最终被他骗走。此后“我哥”又上演了一幕幕酗酒、斗殴的荒唐闹剧，这是他面对荒诞的实在寻找他的人生“魂”的通道，映现的是一种独特的人生“病象”。

“我哥”的来自纪录片摄制组的3个女友在拍一部介绍猪的混合饲料喂养的科教片，却起了个“强力和弦”的片名，不无荒唐。这些人到中年的女性显然是靠依傍男人享受生活的。小说中并没有提供她们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因由：是物质生活的匮乏，还是情感世界的不满足。但无论如何，这总归是社会文明发展与人们精神失落、人性被扭曲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另一种现代病。所幸，空虚落寞的3位女性在十分现代的生存方式中并没有失落其精神秉性上美好的一面：她们不幸，却不自私，她们崇尚物质，精神却不低下。在“我”遭难不幸之际，恰恰是她们显露了难能可贵的无私、体贴与关怀。在她们人性的释放中也确实有着十分积极、庄重的一面。

小说中“我”的同班同学廖瓦讲了这样一个“盗窃大案”：一个儿童玩具厂的两名勤杂工，独出心裁地挖好地道，将儿童玩具上好发条，于是玩具便源源不断地流出厂外。这一个不无幻象性质的盗窃国家资财的案件并非两位工人为了求生而颠覆职业道德的表演，却是生活的本质性荒谬导致的普通人生存的荒谬。作案人的谬行虽然有些超出常规，却是作家循着他们的生存准则和心理走向作夸张渲染的，所以它虽然超常，却带有本质的真实自然性。“盗窃”被赋予了某种可爱的冒险性质，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也因此而被充分地激活。

多甫拉托夫的小说像一面被打碎的，成了许多碎片的镜子，打碎这面镜子并展示碎片中镜像的是作者。作家告诉读者，生活就是由各种微小的荒诞的镜像构成的。荒诞既是一种现实存在，又是一种艺术解构，并由此实现对生活整体、逻辑、现实、未来的颠覆。作家把这种荒诞的解构变成了具有普泛意义的人存在的“土壤和命运”。包括叙事人作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荒诞中，吸进并吐出荒诞的空气，在荒诞中争吵，在荒诞中消亡。

作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家，多甫拉托夫对叙事形式始终有着其独特的追求：“本真叙事”就是他的小说区别于一般的后现代主义创作的独具的“边缘性”特点。

这种“本真叙事”首先表现在多甫拉托夫短篇小说独特的文体上。作家在答记者问时将这种文体称作为“伪纪实主义”。他说，“倘若你保留了所有纪实小说的形式特征，那末你创作的就是一种用艺术手段表现的一种本真。”（И.Сухих 1996：48）“纪实”与“伪”这两个难能搭配在一起的词语本身就包含着文体的某种荒诞性。作家试图以这种形式的荒诞性来表达现实内容的荒诞性。作家认为，荒诞存在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本真特征，而表达这种本真特征的最佳形式就是一种貌似纪实的“伪纪实”。多甫拉托夫小说中的情节似乎都是作者亲历的生活写真。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所发生的事件甚至日期都是真实的。他所虚构的只是一些并非实质性的细节。因此他的小说给读者真实、照相式和高度纪实性的本真印象。这种文体虽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理性精神的纪实性特点，但它们又都不是纪实，不能用简单的纪实性、政论性去规范它们。它是从新闻纪实母体中诞生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它在信息量、真实性方面杜绝“虚构”与“想象”，发挥了新闻纪实性的特长，却又避免了过于讲求客观性的纪实的缺陷。小说凭借作家从现实人生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依靠深深隐藏着的理性统帅材料，对读者发生影响与作用。

日常化已经不可阻挡地成为现代人生存的处境，对于多甫拉托夫来说，它不但是短篇小

说本真叙事的基本素材，而且还成为他文学写作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缘由。在他的笔下，日常生活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大同小异的逻辑范式，而是作家所发现、所把握的各种各样的，多向、多义的复杂关系了。作家在短篇小说中营构的不仅是鲜活的日常生活景观，更是日常生活杂多的统一。小人物生息歌哭在现代都市，特别是在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历史京都彼得堡。他们承受着命运的拨弄，人事的击打，在生活的甬道里直觉地、本真地活着。小说中呈现人生形相的方式不同，或美丑叠现，或善恶杂陈，或得失相属，他们相生相克，相映成趣，使日常杂多统一的本真日常化情景、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的情感、心绪得到感性的显现。小说中的日常化情景不仅是当下的，即时的，而且还具有历史感、时代感。

在作家的眼中，政治风云、世情时尚与自然风云一样，都是身不由己的外在力量。不仅权力在官僚的手中实用主义地利用，政治也成为民众不得已赖以生存的抗拒手段。美丑因时而变，好恶染乎世情，从上到下，无人能够幸免。权力、政治、时尚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被庸俗化为满足私欲的工具，成为人的存在荒诞的缘由。老百姓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生活中的各种角色，不仅被生活所荒唐，也在荒唐着生活，而唯独生计问题，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大官的皮鞋》中市长这样，地铁站站长这样，雕塑家和两个石雕师也是这样，《冬天戴的帽子》中编辑部人员是这样，“我哥”是这样，摄制组的3个女人也是这样。连短篇小说集的主人公，叙事人也不例外。而在日常化的叙写中，作家从不摆出一副教育、训诫者的面孔。正如评论界所说：“多甫拉托夫之所以能赢得读者是因为他并不站在读者之上，优于读者：他在描写丑陋的世界时是以一个受到扭曲的人物的眼睛来看的。他没有必要教会读者什么。”（Н. Лейдерман, М. Липовецкий 2001: 107）

为了达到“本真叙事”，多甫拉托夫在他的小说中采用了一种别致的叙事视角与叙事态度。这种别致的叙述主要体现在小说是在主人公兼叙事人的叙事视角里展开故事的，小说中众多互无关联的生活片断皆由叙事人作者——谢尔盖·多甫拉托夫联系起来。作者并没有像传统的自叙体小说一样采用谴责、批判、嘲讽的叙事伦理态度，而是尽可能地保持了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人物心态，一种即时场景下的主体与事件的同一性，从而规避了创作主体第三者视角的介入，使得事件得以以彼时的面貌真实浮现。作家既保持着对整个故事外在场景的叙述，但他又是受着事件进展走向而被推进的人，同时又在对故事现场的重要参与者（如《冬天戴的帽子》中的编辑、兄长波利亚、3个女人、《大官的皮鞋》中的石雕师利哈乔夫、茨宾、市长西佐夫）的言行进行精确的表述。这些带有特定身份和特殊个性的参与者的出现，使得叙事人不断地被卷入无逻辑的生活流中，而生活的流动亦就演化为各色人等乖张性格和生存欲望的大汇演。“我”（谢尔盖·多甫拉托夫）是一个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者，但“我”又是一个讲述者，一个表演者，又是一个被看者，被问者，被说者。当“我”在作品中不断地重复“我说”、“我说”时，显然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对话者。而这个对话者是优越的，高高在上的，高度理性的，他虽然一言不发，声情不露，但却让人体验到他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洞察力，正是这巨大的理性力量与洞察力使作品消弭了过分的情绪宣泄而进入智者的叙述、理性的思索之中。

“本真叙事”的基本骨架不是故事情节，因此多甫拉托夫的小说不具备复述性，看过他的短篇小说，合上书，你很难讲述出有头有尾、完整热闹的故事来。作品是通过人物的作为、德行来写人物的。作品甚至不以塑造人物为目标，人物都是工具，人物的使命是作为载体而活现世相。活现世相，作家却能越过生活的表相，直扑世相的神髓。为此，他打破了头尾完整的故事，而密集起生活中各种血肉细胞，把诸多富于时代特征的生活碎片加以特写放大。小说中的生活世界是鼠窃狗偷，是卑劣污秽，是失落颓丧。这里没有阳光、鲜花，而是一个荒诞之极的世界。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显现出一种无奈的麻木，或者说是一种超然脱世的旷达。小说的语言高度简约，清新润泽，口语化和生活化。作家正是以一种简约的形式给文坛吹来一股新鲜的清风，呈现出短篇小说独有的精彩。作家尽量向读者的日常心理靠近，甚

至常常把那些非常庄重宏大的概念也都改造成很通俗或者很稚气的话语。所以从语言上读起来感觉很轻松，尔后才能读出一份沉重来，理性思考被深深地隐藏在了通达的语言叙述中。而更多的时候是作家什么也不说，让读者在酸酸的心情中自己去琢磨、顿悟。

荒诞情节与本真叙事的矛盾性结合就是作家短篇小说创作鲜明的诗学特点。这一独特的诗学特点是建筑在作家对生命存在和艺术本质的哲学认识之上的。评论家托波洛夫认为，“存在的荒诞这一美学本质是多甫拉托夫小说的元情节，是作家艺术世界的第一要素，但这不单单是笑料，童话寓言和双关语的运用。这仅仅是得以制成多甫拉托夫艺术之砖的粘土，而不是它的形式。它的形式是一种微观的荒诞。‘宏大小说’的宏大荒诞恰恰是由多种微观荒诞构筑的。”（Н. Выгон 2000: 254）本真叙事创造出一种普遍的现实世界，而荒诞又在解构着这一世界。叙事是向心的，而荒诞是离心的。叙事走向整体性，最大性，而荒诞走向片断性，最小性。这整体与片断，最大与最小的结合便体现出生活最本质的规律性，普遍性。在作家看来，荒诞就是没有规律可寻，而没有规律，没有逻辑，没有意义，没有联系，没有目的就是现实世界的规律。在这一规律主导下，生活中就没有真实与虚假之分了，艺术的真实就达到了全部的本真。潜意识中作家把荒诞理解成为一种生存的危险，他在试图寻找摆脱与逃离危险的方法，却是徒劳的：这首先是因为他自己也欣赏生活中的这种荒诞，并在荒诞中找到了一种对无法预料的事物的审美快感。与此同时，他对谬误、缺陷、失败、懒惰、酗酒、马虎等悖逆生活常规逻辑的日常现象有一种独特的形而上的哲学理解。错误中隐藏着真实，错误乃是生活准确无误的印记。没有错误的世界是危险的，如同极权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是极为可怕的一样。刻意去回避错误，意味着粉饰错误，而粉饰意味着扭曲生活。缺点在道德上和生理上都起着一种平衡的作用，没有这种错误人作为命运与大自然的人就不会是真实的，就是虚假的。不完美实际上是在给社会、个性加冕，还以本真。生活中的失败可以把反面人物变成如果不是正面的，那也会是人们可以理解、接受的，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不无缺陷，甚至病态，都有一种对生活荒诞性的癖好、愉悦。

三

正是这种以生活本真状态显现的人的生存荒诞形成了多甫拉托夫式的，独特的幽默。“笑如同阳光一样是贯穿作家艺术世界的自然要素，乃是他美学体系的基础之源。”（Н. Выгон 2000: 245）多甫拉托夫是果戈里、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之后又一个民间狂欢化“笑文化”的成功的承继者。任何一个当代俄罗斯作家都难得有多甫拉托夫这样独特的“笑声”，独特幽默的写作方式。他遵从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如同文本”的理念，把自己的生平经历以及“照相式”获得的生活材料当作文学资源，加工成具有独特尖锐性和幽默性的情节与冲突并演化为一种高度文学化的隐喻，笑料式的醒世寓言，揭示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现代人生存状态。因此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不无夸饰和怪诞意味的现实生活，一幕幕内心生活被适度放大的精神场景，是不断地颠覆既往文化经验的“超文本”话语。贯穿在他全部创作中的主导性话语及他的“笑”的哲学基础是：荒诞乃是存在的常态。在作家看来，生活常规是以存在的荒诞为表现的。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悖逆传统文学经验一个基本的艺术哲学主题是：文学体验与生活现实的不吻合，理性、经验、意识与生活现实的不吻合。

作家对荒诞的存在——这一生存本质现象的反应是复杂的，有变化的，但源于幽默的“笑”的态度却是始终不变的。“笑”成了多甫拉托夫本真叙事中一个十分鲜明而又突出的特点。“笑”是一种艺术手段，它能大大弱化冲突的尖锐性和忽略人物、事件是非的褒贬性，而加深读者对小说中人、事，各种对象的形而上深意的理解，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趣味性。“笑”也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期待，作者期待着读者参与作品意义的创造。作者自己不说，却让读者在笑中做出他认为的评判来。笑还具有强烈的消解性，它提倡民主，消解一切社会历史的不平等，从而赋予小说高度的平民性，大众性。荒诞被不分阶层，美丑智愚天资才能各不相同的一切人所感知之后，也就显露出了作者认识社会存在的一种自然正义感。《大官的皮鞋》中

在为塑像剪彩的正式隆重的庆典宴会上，市长居然脱下皮鞋为脚丫子“放风”，这不雅观不说，似乎也不符合人物的尊贵身份。但原因是他脚疼，况且他又不是堂而皇之地亮相，而是偷偷地、巧妙地在桌子底下这般动作，最后又能人不知鬼不觉地机智收场，好像又显得正常合理，无懈可击。小说家用幽默的“笑”彻底消解了官僚与平民的界限，从而将高官与普通百姓平等化了。读者自然可以从市长一双外销的苏制皮鞋领会到，高贵的社会地位、出口的品牌、优良的质地、光彩夺目的表相并不能改变其内在的本质：包括生理感受在内的生存规则，对于高官与平民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上述小说中涉及到的“集中营”、“偷窃”、“喝酒”、“斗殴”等现象是苏维埃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常说的话，在多甫拉托夫的小说中以它们在百姓生活中的普遍性而令读者哭笑不得，从而彰显了生活事实的不合逻辑。小说《大官的皮鞋》中，在剪彩仪式的小型酒宴上，石雕师利哈乔夫出乎意料地对举重运动员坦白自己与一个犹太女人同居的事实，在读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叙述中，展示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不合情理，一种突兀性。这颇富喜剧色彩的一笔，让读者感到了人的非理性意识的涌动。作家在貌似冷静的零度叙述后面潜藏着对生活深深的理性关注：现代社会所标榜的人性、人道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人类引以为荣的向善情怀、精神追求也变得虚幻不定，无可依托。作者通过这样一种独特的幽默叙事，使小说巧妙地形成了潜在的张力结构，其表层是幽默喜剧性的冲撞，而它的内涵却延伸到人性的冷漠、乖张甚至异化之中。

笑面的作家从来都不是快活的，从根本上说是阴沉而忧郁的。多甫拉托夫在描述着苏维埃人生存的荒诞和混乱的同时，始终在用一种极为独特的“含泪的笑”的叙事方式表达着人的压抑与忧郁。小说集《监狱》中的短篇小说《演出》的叙事人，不是专制制度的受害者，也非一个旁观的目睹者，而是一个监狱看守。在聆听犯人引吭高唱国际歌时，“突然，喉头一阵哽咽。我第一次成了我独特的，不同寻常的国家的一分子。我成了残酷、饥饿、回忆、恼恨……的集大成者。泪眼朦胧中我失去了视觉。”类似的描叙在《我们》、《手提箱》、《保护区》、《外国女人》、《分支》等小说集中随处可见。评论家们一致指出，他的小说中有一种塞林格式的抑郁忧伤的情绪特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裔美国诗人布洛茨基在他的“论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一文中引用著名美国诗人沃莱斯·斯蒂文斯的话说，“世界是荒诞的，人们是忧郁的”是理解作家创作的一把钥匙。

巴赫金说，狂欢化的“笑文化”的本质在于“它的普遍而广泛的民间性”。（巴赫金 1998：12）多甫拉托夫的创作充分展现了一种平民化的风采——民间情怀，大众趣味。这是他的短篇小说具有大众文化品性和获得大众读者青睐的一个关键要素。他的短篇小说中的“小人物”都是以丰富的生活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面目映现世相的作品。小说中，包括叙事人“我”在内的所有人物都不是圣洁的形象，都是不无病态的。都市“小人物”深深地渗透着作家的生命体验和社会体验。作品抒发了老百姓、普通人的情缘，触发了读者对普通俄罗斯人，特别是都市普通人群生存状态的感悟与思考。但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又富含深刻化、意蕴化、精致化的文学性因素，这又是小说在文学评论界得到普遍赞誉的原因之所在。小说是真正从一个与作家有着同样生平经历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视角进行写作的。它们或以一个监狱看守，或以一个新闻工作者，或以一个“打工仔”，或以一个被迫离开祖国的普通侨民为叙事者，以平视的态度写犯人、写同事、写亲生经历的人和事。他尤其侧重于表现他们的言行方式。小说从不对人物做居高临下的道德审视，小说的主旨也不指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建构，从而避免了传统俄罗斯文学的社会历史和道德审视可能产生的偏激、武断，避免了意识形态主旨对人性的简单化处理。小说从一个平民视角感受外部世界，体验自我情感，充分尊重人物的主体意识，从而获得了表现和探索他们生存、生活状态的深度，并导向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

多甫拉托夫的“笑文化”小说融入了作家众多的理性思考，可开掘的文本资源是很多的。如作家对现实真实性的怀疑，对人性麻木的敏感，对人性异化的追问，对人与人关系错位的

思考等等。作家以一种轻松在表沉郁于内的语调向读者昭示：当人类在享受生活、追求美好的同时，生活中无法掩盖的现实真相会是如此地千奇百怪，甚至触目惊心。现代世俗社会的物化状貌，透射于人们的灵魂，我们读了很是感叹，也可以警醒。但以“笑”为手段的作家显然并不着意于对人物做道德审判，而是把他描摹的人物的不合理行为视为具有不无“现实合理性”的人性现状，从而探究人性的脆弱。作者对现实生存的荒诞和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以现实的背景为依据和依托的。作家认同中的否定是通过这一人性现状所造成的结果来显示，通过戏谑、调侃的方式来表现的。所以这一否定就不是道德批判，而是一种对生命不完美状态的探索与悲悯。作家无意揭露或讽刺人的各种弱点和缺点，而是采取了一种理解，宽容的态度。作家即使对《大官的皮鞋》中那个自上而下的任命体制中产生的市长的描写也没有恶意的嘲讽和羞辱。《冬天戴的帽子》的情节设置表明，作家既深深地厌恶兄长的行为，同时又清醒地知晓，这是一个具有自我生命逻辑的完整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对现实的理解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对话关系，这就使得作品穿越了道德评判而走向对生命的形而上的思考。它昭示了这样的一种生命体验：由于自身的盲目、因为自身无法超越的缺陷生命太容易走入死胡同了。与此同时，他以同情理解的口吻还在展开着生命太容易受到外部世界伤害的叙述。兄长的“世俗”、“势利”固然有自身缺陷造成的必然，同时也有着外部世界的压迫使得原本并不坚实的生命趋于变态这种环境因素。

我们可以发现，多甫拉托夫的创作是一个在既往的文化历史中挣扎、绝望过的个体经验的内心告白，是一幅在新旧时代交汇点上凝望过去，透视人生，展示自我和他人活法的人生世相图。我们在作家对日常生活的荒诞叙事中可以看到他在结构他的作品时对历史语境的尊重与流连心态。读者不仅能重新感知“体制内”人的秉性与行为时尚，也能体悟到人生存在荒诞的某种历史根由。挣脱了极权社会精神桎梏的俄罗斯现代人如今似乎有了狂欢与狂奔的空间与可能，可以像个游牧人这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向四方行走。但是，这一自由对于有过漫长苏维埃历史的俄罗斯现代人来说真是福音吗？既往的思维惯性、曾经有过的文化地图失效了，再也没有方位，没有目标，没有人告诉你前方是哪里，是什么。被人们想象的自由降临之后，在短暂的“解放”“自由”的幸福体验过后，巨大的精神空旷则会给人们造成迷失与恐惧感，这种迷失与恐惧增添了生命存在的荒诞性：一切都不在人们自己的把握之中，然而人们却又必须没有选择地走下去。但是，除了历史的局囿，多甫拉托夫笔下人物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动机缘由不明，当事人似乎也在云里雾里。但是，也正是这一缘由不明的人生的荒诞道出了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人们原以为可以把握的生活其实远不在他们的把握之中。但更值得读者思考的也许还不在于作品已经呈现出来的作家的困惑、迷惘、痛苦。他的不幸已经足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同情和理解。而人们内心经历的一切，人们之所以如此做人、行事的原因，甚至连得到彻底表达的可能都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社会生存动机的被掩蔽的言说的可能，更令人同情与不安。作为冰山之下被搁置的问题，不仅在小说中悬而未决，同时也是现代生活具有寓意性的话题之一：未被我们认知或不被我们了解的事物，就在我们身边或就是我们自身。这显然是人们共同的困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相当多的评论家称多甫拉托夫为“严肃的存在主义作家”。（Н. Выгон 2000： 253）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拥有了为数众多的一支作家队伍。多甫拉托夫作为这一队伍中的重要作家之一，又鲜明地有别于他的同行。作为一个有着鲜明的写实主义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被美国和俄国的评论界称作为“后现实主义”作家。“后现实主义”是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合成，它不仅是俄国，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同美国诺尔曼·米勒的晚期创作，玛加丽特·艾特伍德，罗伯特·库维尔和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等作家一样，多甫拉托夫力图在他的后现代主义创作中突出写实主义的成分。一方面，多甫拉托夫把世界看作是一种正在发生着的、不断变化的文本，其中没有上与下、自我与他人、永恒与暂时的区别，亦即把世界看作是非逻辑的、荒诞的、无序的一种混乱。他对这种混乱的认识和把握是高度形而上的，这是他与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在本质上的相通点。但另一方面，

他的描述又是充分具体而又形而下的——他的创作是对悲剧性社会历史、国家暴力所造成的混乱的一种显性的再现。作家不怀疑现实是一种客观力量的存在，不否定现实在以各种方式对人类的命运产生着影响。他在小说中仍然保持着对人个性的分析、判断和人性评价。通过展示人的个性来把握世界的混乱与无序，试图从中找到一条线索，一个人可以依靠的生存支撑，从而对置身于混乱环境中的人个性的命运做出后现代式的阐释，找到其存在的本质意义。这是先验性的对人生存理解和社会典型化特点相结合的方法，一种本体论原则与社会性、心理分析的认识论原则的结合。

俄国的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了 20 世纪末俄国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式微，但多甫拉托夫现象同时也在证明，作为俄罗斯巨型文学话语的现实主义并没因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与勃兴而消亡。也许这也是多甫拉托夫的后现代主义“热”带给世界文学的一种独特的风采。

参考文献

- [1]《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95, №1
- [2]Генис А. 1996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й Довлатов[A]//Журнал «Звезда» .
- [3]Сухих И., Довлатов С. 1996 Время, место, судьба.[M].Петербург.
- [4]Лейдерман Н.,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2001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трёх томах, 3-й том[M]. М.
- [5]Выгон Н. 2000 Юмористическое мироощущ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M].М.
- [6]《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 1998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Dovlatov: the Important and Glittering Post-Modernist Phenomenon

Zhang Jian-hua

(Russian College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Dovlatov , a contemporary Russian post-modernist writer, is said to be a “ serious existentialist writer ” . His short stories expose the nature of the existence of modern people’s life, the absurdness of life and the absurdness of existence. He has adopted a “ highly natural ” narrative method which is “ pseudo-documentary ” to narrate this absurdness. “ Laughter ” is the source and basis of his poetic system. His writings are fantast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folk “laughter culture” with tears.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e of the absurdness of the text, the absurd narrative method, the author’s philosophy of writing and also the nature of the “laughter culture”, this essay takes a few of the author’s short stories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poetic features of this post-modernist writer.

Key words: Dovlatov ; absurdness; natural; narrative; laughter

收稿日期: 2003-5-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01JAZJD50.47-99002),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承担。

作者简介: 张建华 (1945—), 男, 浙江省余姚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重点研究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当代文学、俄罗斯小说。

[责任编辑: 刘 钊]